

当代苏联文学

孙尚文 编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 •

责任编辑 李建唐

封面设计 谭成荫

责任校对 音 尘

当代苏联文学

孙尚文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8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字数: 200千 印数: 1—2,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 10429·051 定价: 1.90元

ISBN 7-5610-0027-8/I·12

前 言

提起《当代苏联文学》的编写，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事了。当时省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会开会，讨论一九八三年科研规划。有的同志提出要编写一套《当代外国文学》以满足社会需要。《当代苏联文学》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编写的。

文学史的编写是项十分艰难繁杂的工作，它不仅要求编写者准确地掌握大量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而且还要有正确的编写指导思想和科学合理的结构安排。编写《当代苏联文学》就更是如此。当代苏联文学从五十年代中期算起，到今天已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当代苏联文学经历了极大的变化，文学现象十分复杂，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在编写过程中，尽管我们力求遵循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学风，尽力涉猎苏联近几年编写的文学史资料 and 我国出版的有关文献，但因时间紧迫，疏漏错误一定不少，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参加本书编写的同志有郭家中（《当代苏联戏剧》）、王守仁（《当代苏联诗歌》）、辛守魁（《当代苏联小说》）、王复仕（《当代苏联文学理论论争》）、刘航（《肖洛霍夫》）、尹厚梅（《柯切托夫》）、齐广春（《列昂诺夫》、《舒克申》）、马淑贞（《西蒙诺夫》）、代玉芳（《拉斯普京》）、孙尚文（《当代苏联文学概述》）。

另外，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辽宁大学出版社的有关同志曾给予大力协助，李建唐同志曾为本书做过三次审阅和修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孙尚文

1987年4月于沈阳

目 录

第一章	当代苏联文学概述.....	1
第二章	当代苏联小说.....	21
	肖洛霍夫.....	76
	列昂诺夫.....	85
	西蒙诺夫.....	96
	柯切托夫.....	104
	舒克申.....	118
	拉斯普京.....	129
第三章	当代苏联诗歌.....	141
第四章	当代苏联戏剧.....	179
第五章	当代苏联文学理论论争.....	227

第一章

当代苏联文学概述

当代苏联文学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它的现状如何？它同过去比较有些什么变化，什么不同？它将向何处发展？这许许多多问题，在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为很多同志，特别为很多青年朋友所关心。看来，这种关心并不是没有道理。早在1932年鲁迅先生便称俄苏文学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从那以后五十多年来俄苏文学以及它的一些光辉形象，如：郭如鹤、恰巴耶夫、楚马罗夫、保尔·柯察金、奥列格等便在中国人民中间有着深广的影响。可以说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与过去苏联文学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因此，当世界跨入电子时代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当代苏联文学的发展，对了解今天的苏联社会和我们自己的四化建设都不是没有裨益的吧！

十月革命洪流中诞生的苏联文学确实开辟了人类文化新纪元。战后几十年来，苏联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近二十年来，苏联文学变化很大。它业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当代阶段。那么什么叫“当代”呢？一般来讲有两种说法，一是指1945年以后，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这一时期，另一个说法，在苏联文学上是指斯大林逝世后或1956年以来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苏联社会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1953年，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逝世。1956年，苏共廿大召开。1967年，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上天。1977年，苏联颁布新宪法。这一时期，文学上的重大标志是充满了“文学与生活”、

“文学与时代”的重大争论。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质探索”、“文学与科学的相互关系”、“文学与科技革命”、“文学与新人”、“人道主义问题与当代文学”、“当代文学中的英雄人物”、“文学与当代”、“苏联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等论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这些争论不仅涉及到文学与社会生活，也涉及到哲学、道德，涉及到“真与假”，“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等许多问题。照苏联评论家的说法，今天苏联作家们所关心的问题，“再不仅仅是国家的命运，而且还有整个星球以至宇宙的命运”。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的二十年间，苏联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人阶级人数已达到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农民文化程度已接近工人阶级，农村正在走向城市化。科技革命成了文学发展的新动力。这一时期的苏联文艺批评再不是“单一的和简单化的了。”社会生活动荡多变，文艺批评也不可能协调一致。“思考”、“思维”、“寻找”、“创作探索”、“探索真理”等这样一些词在文学评论中经常出现。“研究生活”、“分析生活”字样随处可见。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人物形象。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特别注重对普通人的描写，“关心人的命运和人的价值”，人道主义成了一面“衡量真正进步的最高准则”的大旗。作为苏联文学基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思想美学原则再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成为活生生的、发展着的、不断丰富着的范畴”而开放了。“客观地认识不断发展的现实是没有界限的，题材的选取以及生活真实的表现手段和方法也是没有界限的。”“别的体系的诗学成分加入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中来，一般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能的了”。由于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重大变迁，物质生活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出现了极不协调现象，再加上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平与黑暗，致使许多人单纯地滋长了“消费心理”，变得精神空虚和玩世不恭。库兹涅佐夫说：“随着向共产主义进军，工业发展，物质生活提高，出现了人的心灵空虚，精神真空的

危险性”。这就使苏联文学在道德问题上向社会各个领域发动了一场经久不衰的批判。上述种种情况都告诉我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当代苏联文学，是一种既发展，又徘徊，既繁荣，又矛盾的文学。

五十至六十年代在当代苏联文学史上被看作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它是苏联文学史转折的新时期，是“苏联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文学问题》，1974年第5期，第9页）。这一时期文学上的一个极重要特点是批判性的现实主义增强和对浪漫主义粉饰与夸大的摒弃。许多反映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反映现代人形象的作品产生于这一时期。1956年苏联共二十大召开前后，苏联文艺方针的重点也转到了揭露“阴暗面”和鼓励创作“自由”上面。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提出：“发掘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暴露缺陷”（九月全会讲话）。“大胆、深入地了解现象的底蕴，无畏地描写生活，连同困难和矛盾——这就是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决议对作家的号召（《文学报》，1953年12月12日）。后来又指责文艺“落后于生活，落后于苏联现实”，批评文艺界“容忍那些枯燥无味、粗制滥造的作品”，没有给“平庸和虚假”以“应有的打击”。与此同时，在文艺创作上也放宽了限制，恢复了一大批过去受过批判的作家的名誉，如M.布尔加诺夫、A.普兰诺夫、M.佐申科等，开始了与外国文艺界的来往，人道主义、写真实、反映时代精神、自我表现、艺术革新等文艺理论问题上的争论也极为活跃，苏联文艺界出现了“解冻”的景象。这里应当指出，苏联文艺方针上的这些作法确实有其积极一面。不过促进“解冻”阳光的出现时期绝不始自1956年。早在1952年2——4月，斯大林本人就对“无冲突论”提出质疑。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把一切规律，不管是自然科学规律，还是社会科学规律都视为客

观存在，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也不总是相适应的，一句话，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根据斯大林这一论述，1952年10月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总结报告中，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了苏联各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号召艺术家要“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1952年4月12日《真理报》就此发表社论《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对文学中那种违反生活规律和文艺规律的“无冲突论”发动了批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2年9月作家奥维奇金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才得以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接着《真理报》又连续发表了他的几篇续篇：《在前方》（1953年），《在同一个区里》、《亲自动手》（1954年）和《艰难的春天》（1956年）。这五篇特写插写的是同一个区里的同一些人物，后来以《区里的日常生活》总题目成书发表。在书中奥维奇金以尖锐的笔锋深刻地揭露了官僚主义者包尔卓夫之流的顽固、保守、冷酷无情，针砭了社会的黑暗时弊，被文艺界奉为当代苏联文学中的“第一只春燕”，对当代苏联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正是在奥维奇金带动下，特写小说曾风靡一时，许多以暴露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作品相继出现，像Г.特罗耶波利斯基的《农艺师手记》，А.卡里宁的《中等水平》、《违禁区》，Г.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Вл.田德里亚科夫的《伊万·楚普罗夫的堕落》、《死结》、《阴雨天》、《不称心的女婿》、《路上的坑洼》、《岁月飞逝》，Е.多罗什的《农村日记》，Вл.索洛乌欣的《金底》、《弗拉基米尔乡间公路》，С.扎雷金的《今年的春天》、《红色的三叶草》，А.雅申的《杠杆》，С.沃罗宁的《不需要的荣誉》，恰科夫斯基的《我们正在选择的道路》，维尔希柯拉的《老家》，Г.巴克兰诺夫的《在灰雀村》，Л.奥布雷娃的《小城格卢贝》，И.拉弗罗夫的《入迷的女人》，潘诺夫科的《老枫树》，А.格拉宁的《婚礼之后》，С.安东诺夫的《事情发生在平科夫》等。这些作品，有的尖锐地提

出了社会真实问题，对社会生活进行积极的反映，有的辛辣地讽刺官僚主义，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再由于作品内容多以事件为中心，围绕事件借助抒情、特写、纪实、对话来展开矛盾，刻划人物性格。叙述简洁、客观，实际生活性强，经常给人以真实之感，很符合时代需要，在社会上很受欢迎。以致使它在苏联五十年代几乎垄断了整个文坛。1960年1月莫斯科作家协会在报告中说：“这些年来特写压倒了一切体裁”。这也为文学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创作道路。至此，许多作家都对暴露消极现象和提出尖锐问题关心起来，纷纷写这方面的作品，其创作范围也从农村题材扩大到各个领域。如И. 格拉宁的《走向雷电》，Г. 尼古拉耶娃《前进中的战斗》，В. 科热夫尼科夫《这位是巴鲁耶夫》，Ю. 特里丰诺夫《解渴》、《在秋天的小站上》，纳吉宾的《下去，到地方啦》，Г. 弗拉基莫夫《大矿》，В. 波烈伏依《在荒岸上》，В. 奇维利欣《关于克拉娃·伊凡诺娃》，А. 列凯姆丘克《黄口小儿》，В. 利帕托夫《里亚尔》，卡扎科夫的《在车站上》等。这些作品在描写社会生活方面，大多从新的高度来看待时代矛盾并重视人民在解决这一矛盾中的主导作用。当代苏联作家这种创作风格上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社会矛盾的深入研究，表现在他们对复杂的社会道德问题和人物的内心活动的关注。В. 奥维奇金，Г. 特罗耶波利斯基，Е. 多罗什，В. 田德里亚科夫，А. 伊万诺夫，С. 扎雷金，В. 舒克申，П. 普罗斯库林，В. 索洛乌欣，С. 阿斯塔菲耶夫，Е. 诺索夫，Ф. 阿勃拉莫夫，В. 别洛夫，С. 克鲁季林，В. 福缅科等许多作家都具有这些特点。他们在揭露社会经济矛盾的同时，极其注重研究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心理活动在道德、精神、感情上的各种表现形式。例如田德里亚科夫在小说《伊万·楚普罗夫的堕落》中就给我们揭示了一个人的蜕化心理活动，明白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比为了人的尊严和正直而斗争更有意义这一道德含义。

自从特写小说问世之后，二十多年来它在苏联文学中源源未断。其体裁发展亦从短篇扩展到中长篇。有些特写小说，像B. 格拉宁的《旅游指南散记》、《美丽的乌达》、《石花园》，卡扎科夫的《北方日记》，C. 斯米尔诺夫的《布列斯特要塞》，H. 萨弗罗夫的《一滴血》，别洛夫的《和谐》以及特瓦尔多夫斯基，K. 帕乌斯托夫斯基、潘诺娃，多罗萨、索洛乌欣、特罗耶波利斯基、冈查尔、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的作品都颇负盛名。

本来苏联文学中出现的“解冻”现象，对“无冲突论”的批判和对社会阴暗面的恰如其分的揭露都无可非议，符合苏联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它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这种批判和揭露，苏联社会中积聚已久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等弊端就不能克服，粉饰现实，欲盖弥彰等现象就不能铲除。问题在于苏共二十大之后提出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路线，把批判锋芒不仅指向官僚主义，而且还指向斯大林本人，甚至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A. 索尔仁尼津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是如此。

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日瓦戈医生》中通过一个知识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三十年的坎坷遭遇，流露出一种对革命的悲观失望和怀疑情绪。索尔仁尼津则通过小说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生活经历，以低沉的笔调描绘了苏联劳动营的阴暗内幕。小说大肆渲染劳动营生活环境的恶劣，管理人员的残暴，劳改犯人的无辜，以此来唤醒人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与否定。小说的恶劣客观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从这篇小说开始，“集中营文学”在苏联曾一度流行。其它如杜金采夫的《不单靠的是面包》，爱伦堡的《解冻》，凯特琳斯卡娅的《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阿尔丹-谢苗诺夫的《峭壁上的浮雕》，巴克拉诺夫的《41年7月》，邦达列夫的《寂静》，罗佐夫的剧本《祝你成功》，阿尔布佐夫的《伊尔库茨克的故事》，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等都

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倾向。

全盘否定斯大林在社会思想上和文学领域里造成极大混乱，致使一些人对苏联过去三十年来的文艺成就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一些人对人民性、党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全盘否定斯大林也给青年一代带来了灾害，使他们丧失了信仰和理想，理论上无所适从，精神上迷惘彷徨。被西方称为“垮掉的一代”的“第四代作家”这时也应运而生。他们不仅“怀疑斯大林的价值，而且也怀疑过去的全部历史”。作家阿克肖诺夫说，他们要“完全摒弃个人迷信时期的生活方式和风气”，要“自由的呼吸”。这“自由的呼吸”换来的是“自由化”和“非英雄化”的泛滥。非英雄化倾向的拥护者们强烈要求摆脱“教条主义”束缚，反对“无冲突论”，要求讲出自己的“生活哲学”。他们认为过去那些维护“党性原则”的作家，是给党的任务作插画，是“不真实的”，“不诚实的”。作家邱赫莱说：“我反对把革命理解得太美化，反对公式化的英雄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艺术。我拥护合乎道德，合乎自然的英雄，对于这样的英雄来说，道德就象呼吸一样自然。”

“我从来不给自己提出这种问题：我要表现正面东西呢，还是反面？我要拥护呢，还是谴责？”在这样鼓噪下，一大批具有非英雄化倾向的作品，如《带星星的火车票》、《摩洛哥的桔子》、《我要做真正的人》、《半公里的距离》、《感伤的罗曼史》、《十三号住宅》、《吉拉·格奥尔吉耶芙娜》、《新年的第一天》、《一个幽静的地点》、《桦树林》、《亚当与夏娃》、《姊妹河》、《母鸡神》、《传说的继续》、《没有妇女，只有反男人》、《奥扎》、《许诺》、《柔情》、《挥手》、《垮掉分子的独白》、《三角梨》，《A、B、B、Г、Д》、《明天该做的事》等纷纷出现。这些作品有的热衷于描写难解难分的爱情，有的大肆渲染死亡的不幸，有的追求激愤、孤独、绝望心境，有的对堕落少女、流氓阿飞、虚无的伪君子表示同情。《感伤的罗曼史》中的复员军人、报社分社主任库什里亚

曾是个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为革命流过血。然而后来的生活却变得十分空虚、猥亵。他活着的目的只图一时享乐，除此再没有别的崇高目标与信仰。他忘恩负义地赶跑了战争年代里和他生死与共的女友科萨尼娅，又追求新欢与丽兹卡结合。“他的午餐是一顿丰盛的美味佳肴，有啤酒、有龙虾。库什里亚坐在桌旁，真不愧是一家之主，受到了无以复加的尊重与照顾。看得出来，他对此是早已习以为常了。”《带星星的火车票》中的青年主人公们出于“信仰的危机”，向一切传统观念和权威提出了挑战。他们提出，“宁可当流浪汉，到处碰壁，也不当一辈子小孩儿，只是按着别人的意志生活”。结果几个人从家里走出，去进行“独立思考”与“探索”。由于他们失去了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追求的只是虚无主义的自由，到头来生活现实所给予他们的仍然是个“往哪儿去呢？”的迷惘的未知数。

《十三号住宅》中的退伍上校科瓦廖夫，虽然身经百战，受过革命战争考验，在和平生活环境里却是个自私自利的告密者，十三号住宅里的居民被他搅得心神不安。《继承人》里的普斯得宁上校是个惊人的个人主义者，他除了“学习”之外，就是追求个人的舒适生活。《大海的史诗》里的青年工程师瓦列里·果里克心灵空虚、目光短浅、自私自利。他不关心大海，不关心工程，不关心别人，只关心自己。他活着就是为自己，而且仅仅为了自己。他欺骗女性，然而并不感到羞耻。他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不，最好请等等。主要的还不在于我怎么样……是的，我当然缺德。然而，我的没德行算得了什么呢？什么也算不了，沧海一粟而已。”

艾里亚舍维奇在评论这种倾向时说：“对于老一辈的经验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企图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是必要的了——诸如此类的无稽的偏见，的确是比较明显地流传在一小部分青年文学家之间。”实际上，受这种思潮影响的作家不仅仅是青年，有些老一代的作家作品也存在有类似倾向。像爱仑堡的

《人·岁月·生活》，雅申的《沃洛格达婚礼》，涅克拉索夫的《大洋两岸》等。这类作品的出现曾引起苏联社会各界舆论的强烈不安。批评家O.列兹尼科说：“有些文学家的立场使我震惊，他们好像羞于大胆勇敢地捍卫先进思想”。巴斯卡科夫写道：“不久以前，我们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都突然一下子变成了脱离集体，逃避集体的孤家寡人了”。

五十年代中期，苏联文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艺术地描绘当代最复杂的冲突——战争与人的冲突，反映战争中人的悲剧和新形成的过程。在这方面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1957年）（又译为《人的命运》）有其特殊意义。小说主要描写司机索科洛夫的一生遭遇。索科洛夫战前有一个美满家庭，妻子温柔体贴，孩子们聪明活泼，他的生活“心满意足”。突然战争爆发了，他应征入伍，不久又当了俘虏。几经苦难，最后他逃回了祖国，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巨大不幸。妻子和两个女儿被炸死了，剩下的唯一亲人——儿子又在胜利那天牺牲。复员后，他又去当司机。在一次小的交通事故中他的执照被警察拿走，于是他便和他收养的孤儿一起过起了痛苦的流浪生活。苏联报刊认为这篇小说“以巨大的艺术力量表现了对战争和法西斯黑暗势力的强烈抗议，表现了对于人及其坚强、勇敢和酷爱生活的伟大信念”（1959年8月19日《真理报》），在“战后文学中还没有一个人物能像索科洛夫如此痛苦的命运。这是篇悲剧性小说。”（《文学问题》，1958年第11期）。确实，如此淋漓尽致地描写战争创伤及其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不幸，肖洛霍夫可谓独树一帜。尽管作品流露有感伤情调和人性论色彩，但它披露了战争残酷真相，指出了苏联人民的痛苦牺牲，表现了人民的坚毅不屈的爱国精神，再加上作品叙述细腻感人，描写生动抒情，使它为苏联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开辟了新道路。继肖洛霍夫之后又有一批作家走上了从新的角度反映战争的道路上来。这就是苏联文学史上所说的反映战争题材的“第二浪潮”。这一流派的特点是在“写真实”的口号下大肆

渲染战争恐怖与灾难，极力描写“战壕里的真实，穿插“战地鸳鸯”和三角恋爱等情节，并以心理刻划和悲剧气氛来吸引读者。这一流派后来被称作“战壕真实派”，它与“司令部真实派”曾发生过一场严重论争。到了六十年代末期，“战壕真实派”的许多特点：固定不变的格式，自然主义细节的描写等便逐渐被淘汰。鲍戈莫洛夫的《伊万》和《卓霞》，贝科夫的《第三颗信号弹》和《阿尔卑斯山的颂歌》，巴克兰诺夫的《饱尝痛苦》和《一寸土》，卡列宁的《严峻的战场》，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H. 楚科夫斯基的《草莓花开》，涅克拉索夫的《第二夜》等都是当时的代表作。这一时期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还有阿纳尼耶夫的《坦克成菱形前进》，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军人不是天生的》等。

在《一个人的遭遇》影响下从五十年代后期起人道主义思潮在苏联文艺中日益高涨。从苏共纲领、作家代表大会决议到专业报告、创作评论、文艺作品都充满着人道主义、人性论说教。“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人和人是朋友、兄弟、同志”、“人道主义思想……始终是衡量真正进步的 最高准则”等口号层出不穷。在人道主义这面旗帜下，文艺作品也从过去“无冲突论”转向了“写真实”，描写“小人物”的痛苦与不幸，揭露社会市侩等道德题材上来。如拉弗罗夫的小说：《庇护》、《守夜人》、《娜嘉的苹果树》、《松林间的小房》、《婚礼之客》、《寡妇》。安东诺夫的小说：《彼嘉·鲁萨》、《驭者》、《伙伴》、《害人精》等主人公都是普通人，而且都遭受着痛苦与不幸，充满着悲观绝望情绪。在《庇护》中孩子目睹父母不和，心灵上倍受摧残；在《娜嘉的苹果树》里一个孤独的老实人养育多年的孩子被夺走，只因为对方有形式上的父权；《松林间的小房》里的老妇人在战争中已失去长子，又惊闻幼子成了坏蛋；《兰色的井》中的青年因失恋而痛苦，夺走他未婚妻的却是个流氓。其它如埃利马尔·格林的短篇小说集《母亲》，B. 扎克鲁特金短篇小说《向日葵》

以及П. 马尔蒂诺夫, С. 希帕乔夫, Я. 斯麦里亚科夫, Н. 雷连科夫, Е. 维诺库罗夫, В. 舍弗涅尔等人的诗歌, А. 阿尔布佐夫, В. 罗佐夫, Л. 佐林, А. 沃洛金等人的戏剧也无不把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描写主题。也有些作品过份渲染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 如В. 马克西莫夫的《人活着》等。

一些老作家为了顺应这股思潮也将旧作重新改写或再度构思, 如П. 列昂诺夫把1927年出版的《贼》进行了改写(1959年), 对小说文体、内容做了重新安排, 增加了小说主人公米其卡·维克申去西伯利亚参加建设并最终获得新生的情节, 使人道主义思想突出。肖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中也改变了一九三五年的构思, 不仅在人物安排、情节发展上有变化, 而且加强了主人公们的人情、人性描写, 使“人的价值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加明确”。

六十年代初, 作家们在思想上与艺术上的探索大多与对人物的认识, 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密不可分。新的时代给作家们提出了新的矛盾需要解决。只有深入地研究社会经济矛盾, 才能使文学在艺术真理的大道上阔步前进。这一时期文艺作品描写的中心问题仍然是领导作风问题。官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发生了根本矛盾, 阻碍着社会发展, 于是作家们就在自己创作中对这种现象进行揭露和鞭笞, 以唤醒社会觉醒。这方面有影响的作品有Вс. 科切托夫的《州委书记》, Е. 马尔采夫的《走进每一家》, П. 普罗斯库林的《苦草》, Ф. 阿勃拉莫夫的《两冬三夏》, В. 福缅科的《对大地的怀念》, В. 田德里亚科夫的《短路》, А. 伊凡诺夫的《阴影在中午消失》, М. 阿列克谢耶夫的《樱花潭》、《面包是名词》, С. 克鲁季林的《利彼亚吉》, Г. 马尔科夫的《父与子》等。

1956年末到六十年代中期的抒情文学仍然在继续发展, 而且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起来。写实性和自传性结合原则, 社会和个人结合原则业已成为О. 别尔戈丽茨和В. 索洛乌欣创作的基本

格调。如别尔戈丽茨的《白昼星辰》通过作者的回忆与思考，表现了一代人的道德面貌。而索洛乌欣的《一滴露珠》则通过日记与回忆描写了生活之美和对幸福的追求。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在许多作家的抒情作品中得到了反映。普里希文是最早写这类主题的作家之一。他把人与自然的联系称做是社会主义个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他的抒情短篇集《大地的眼睛》就很有代表意义。其它不少作家的作品也都具有抒情特点。在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作品有：E. 诺索夫的《轮船远去，两岸依旧》，B. 拉斯普京的《临终》、《顺流而下》，H. 吉洪诺夫的《回忆录》，B. 卡达耶夫的《墙上的小铁门》，B. 利霍诺索夫的《我深深地爱你》、《塔曼秋色》，兹纳明斯基的《不白的雪》，B. 阿斯塔菲耶夫的《战争在某处轰鸣》、《老橡树》、《最后的问候》、《云杉涛声》，O. 科茹霍娃的《草木樨》，B. 齐宾的《幸福的时光》，P. 加姆扎托夫的《我的达格斯坦》等。

特写小说和哲理小说也都注重抒情描写和对道德责任问题的探讨。如C. 扎雷金的小说《额尔齐斯河上》对中农查乌佐夫的刻画，C. 沃罗宁在《两种生活》里对地质勘探队的描写以及M. 奥布霍夫的《生活是阻挡不住的》，A. 伊凡诺夫的《牵牛花》，П. 尼林的《试用期》和《冷酷》，M. 阿列克谢耶夫的《卡留哈》，M. 斯捷里马赫的《面包与盐》和《人血不是水》，B. 贝洛夫的《扒手》，E. 诺索夫的《秋季展览会的第五天》、《草原上的孤草飒飒响》等无不饱含着浓墨重染的抒情味道。抒情小说的新颖及意义不仅在于它重视道德问题，而且还在于它对解决这些道德问题所持的社会主义思想基础。到六十年代后期，在理论问题争论的白热化中抒情小说开始受到社会长篇小说的挑战，不过就整体来讲，它仍然在发展着。

二

1964年10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更迭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主观

主义和唯意志论”的批判，使苏联文学再一次发生变化，使它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通常所说的七十年代文学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特点是动荡趋于平稳，探索日益深入，争论不断发展。例如，关于人民性、党性原则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争论，关于对七十年文学估价的争论等都很活跃。在这期间，苏共领导人与苏联报刊一方面严厉批评文艺界的“非英雄化”和“简单化”的“两个极端”，另一方面则强调“恢复列宁主义原则”，“贯彻党的艺术创作的路线的积极性和原则性”。《共产党人》杂志65年第17期发表B. 伊凡诺夫文章《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因素》。他认为苏联文学创作中存在“两种不利倾向”：一方面以《十月》为代表，虽然主张写“英雄人物”，但只是停留在“主观愿望上”“缺乏艺术要求和才能”，结果“使正面人物信誉扫地”；另一方面以《新世界》为代表，强调“写真实”，“反对粉饰”，“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因而“堕入自然主义”和“非英雄化”。至此苏联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讲话要求写“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例如《真理报》社论《充分反映苏联人民的伟大事业》和《新世界的建设者——文学的主人公》，索波列夫在俄罗斯联邦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苏联文学和培养新人》等。一九七一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会议上再一次对“两个极端”进行了谴责，提出“主张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为基础的丰富多彩的形式和风格”。一九七二年苏共中央又专门作了《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指责批评界在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方面“仍然不够积极和彻底”并且责令各创作协会“对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此后苏共领导人在二十五大、二十六次会议上都对文艺方针问题作了进一步强调说明。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问题 Л. 马尔科夫等人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意识的一种新类型”，“是历史地开放的、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艺术形式的体系”。它“对客观地认识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来说是没有止境的，题材的选择是有限制的”，